

台灣全球化過程中的女性專業人士： 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反思的起點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摘要

台灣的女性經歷著全球化潮流對女性的貶抑，這是透過本土父權完成的。但台灣的女性進入全球化專業領域，並受到全球化潮流的歡迎，則是在擺脫本土父權，且有助於西方將本土父權透過她們加以女性化。經驗似乎顯示，台灣的專業婦女對主體性的渴求相對較低，對國際規範與本土實踐之差異，則容忍度相對較高，故由專業女性向台灣輸入全球化規範最為平順。同理，女性化的台灣對主體性的渴求也低於中國大陸，而對全球化潮流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容忍度亦較大，故由台灣向中國傳送全球化規範與價值，較諸直接進入中國，其間產生的碰撞要小得多。台灣不能接受女性化的話，不僅意味著中國大陸亦不可能默許女性化工程，也使西方缺乏一個重要的軟化中國的機制，此何以台灣專業婦女進入全球化的專業領域，其意義不單純只是台灣本身的性別政治正在變遷，更關乎何謂「中國」之類的後殖民主義疑問。

關鍵字：中國、台灣、全球化、女性主義、女性專業人士、後殖民主義

一、中國式的模糊

在中西文明相互激盪下，「中國」已成為一個無法具體化的對象（P. A. Cohen，1984）。在生活、觀念、語言等等方面，都表現出若干刻板印象中的西洋特色，而他們基於自己非中國化的內容不同，而傾向將其它自視為中國人的族群，歸類成中國程度較低的人，引起彼此之間的相互成見（例見 Kenneth Libenthal，1982）。故除了站在西洋文明角度的人，不能容忍失去一個能凸顯先進西方的落後對象（Samuel Huntington，1993）；力圖振興民族的中國人，也恐怕西洋的資金、人才、制度、產品，會顛覆自己的文化認同，從而需要鞏固中西有別的印象（例見宋強，張藏藏，喬邊 1996）。

中國文化已經自願或非自願地與西洋文化雜處；中國主權疆域分分秒秒經歷著移民、資源或訊息的穿透。如欲釐清，難免就必須面對這些造成中國概念模糊的現象，故於今之計，便不宜再先假設存在一明晰的中國（姜義華，1996），相反地，欲理解何謂中國，就必須先認識到，吾人乃是在理解中國式的模糊，故須一套以模糊為前提的概念。基於此，就值得介紹後殖民主義的女性主義知識論與台灣的文明地位。本文的目的，是經由訪談台灣的職業婦女，來了解全球化過程如何藉著各式各樣的女性化工程，來塑造一個想像的中國。

二、後殖民主義的女性主義知識論

後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所努力者，是解放於往昔社會科學知識論的束縛。社會科學主要研究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行動，並賦予此一行動某種普遍性的解釋，分析者能將研究對象的行為，化約成外在客觀結構的互動結果（Mancur Olsen 等，1982）。女性主義不承認人的行動只有單一科學意義，而主張同一行動在不同角度之下，可以體會成不同的經驗，這就無異於否定了普遍性客觀規律（Sandra Harding，1991）。現在更有所謂陰陽共生的主張，使得行動主體的複雜性，在學術上成為可以接受的起點（Kate Millett，1970）。後殖民主義學者則又將陰陽共生的思路，作了一個歷史上與文化上的推展，從而更進一步衝擊了古典的社會科學研究（S. Krishna 等，1993）。

在世紀之交，前殖民地，以及遭資本主義全球化潮流撞擊的非基督教地區，紛紛出現文化認同問題（Jongwoo Han and Lily Ling，1988）。然而純淨的本土認同已不可得，

就連表達本土情懷的語言及型態，都染上濃郁的西方色彩(G. C. Spivak, 1988)。這種混血現象應和了女性主義所體會的陰陽共生，於是當前社會科學家難以釐清的渾沌狀態，就有了一個可以觀察的立場。後殖民主義者的貢獻，在於他們更細膩地去研究共生的機制，說明共生現象因人、時、地而各有異的歷史因素(R. Young, 1995)。

站在全球化潮流立場的資本家、媒體與知識分子，常不經意地用女性化的概念描述後殖民地地區。這種將統治對象女性化的態度，更早也存在於前殖民母國對待前殖民地的方式之中(L. E. Donaldson, 1992)。則站在所謂本土立場反彈的當代本土菁英，往往也就對自己的陽剛氣質是否獲得認可，感到特別的敏感，並進而找尋可以被自己女性化的對象，以此檢視自己獨立與否？由於本土內涵早遭全球化潮流所轉化，故以抗拒作為唯一訴求的本土領袖，反而讓其所領導的人民疏離。再加上實際利害的糾葛，致使抗拒的訴求，不切實際(崔之元, 1996)。

相反地，後殖民地巧妙地利用全球化潮流關於自己的想像，甚至操縱資本家、媒體與知識分子的幻覺，使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行動選擇，其中以他們對女性化工程的回應為最，使得不少西方資源，投入那些接受女性形象的後殖民地(石之瑜, 1997)。不過，這種的調適難免強化全球勢力與後殖民地之間男尊女卑的優劣印象。但這又不能一概而論(C. Monanty, 1991)，畢竟值得愛憐的後殖民地人，必然也傳承著本土文化意識，使得看來暢行無阻的的全球化工程失去提防，耽溺於尊貴的自我想像，而忽略了後殖民突變，這些突變其實未必有利於西方(A. Org, 1987)。

所謂後殖民突變，就是後殖民地因地制宜地在不知不覺中重新詮釋了全球化，所以並非單純地處在一個被動接受的位置(Lily Ling and Chih-yu Shih, 1998)。另一方面，本土意識的復甦抵觸了無孔不入的全球化，加深全球化推動者的疑慮，進而與當地買辦勾結，拉一派打一派，所拉的就是接受女性化工程的人，所打的就是本土復興力量。但作為買辦的（商品的、知識的、資本的、意識形態的、軍火的等等），而且不抗拒女性化的人，都有本土情懷，故不可能是全面性地依附在全球化潮流中；甚至高舉民族旗幟，終日琅琅本土自覺的人，也都一定程度地因為對內在的全球化影響除惡未盡，而根本不是什麼純粹的本土力量(N. Soguk, 1993)。

兩股本土流派，又相互女性化。買辦階級將本土勢力當成落後的、情緒的對象，自己則站在先進的、理性的角度(例見許信良, 1995)，一如全球化潮流面對他們時的態度。本土復興勢力亦視買辦階級為依賴的、短視的對象，則自己乃擔當著社會追求獨立、長遠利益的任務（例見華原, 1990）。落後的、情緒的、依賴的、短視的均屬刻

板印象中女性氣質毋庸置疑。當後殖民地人因事因時而出現買辦或本土傾向時，全球化勢力拉一打一的結盟策略，成爲事實上的不可能，概每個人都是全球化潮流的地區代理，也同時是隨情境散發反抗情緒的本土愛國者。

在中國，在全球化將中國女性化，與中國女性持續在中國之內被刻板性別形象固定化，是兩個平行發展的現象。而中國婦女受到女性化的情形愈嚴重，則女性愈適合扮演那個夾在全球化與本土化勢力之間的角色，因爲她們精確地滿足了全球化勢力的想像（K. Robinson，1996），但也軟化了全球化趨勢對本土菁英的威脅程度（石之瑜，1996）。女性對全球化勢力的反彈是隱忍的，受到本土力量的支持，這個支持對全球化產生的抗拒力量，當然是間接而軟弱的。

在進入全球化潮流之後，女性取得了脫離本土父權的心理機制，使得本土父權對她們的刻板印象遭到顛覆（Ellen R. Judd，1990）。只是全球化潮流將中國女性化的作風，與中國父權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本土傳統道理相通，抵消了個別女性加入全球化陣營取得的獨立位置（L. Y. C. Lim，1990），使她們得繼續面臨本土父權力量的君臨（L. Y. C. Lim，1987），也誘使她們更進一步地依附在全球化陣營中來逃避本土父權，除添增了自己在西方之前的可愛與可憐之外，恐也讓西方將中國的女性化，與本土勢力將買辦階層的女性化，都獲得強化。這就使女性處在兩者之間的尷尬，益發成爲只有女性才適合承擔的壓力，並造成全球化潮流與本土化運動彼此之間更深的、更大的錯覺，這是後殖民中國女性面臨的文明困境。

三、後殖民中國的女性化

中國受到女性化的經驗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但中國地大物博，在醒獅論與黃禍論之下，對西方國家所形成的潛在威脅，令彼等感到不安（R. Baker，1996）。逃避之道或可將中國人民女性化，但將彼等之政府看成罪惡淵藪，則又有了敵人，又有了待援的弱勢性別，可以一舉兩得。在中國找尋女性氣質的需要是持久的，倘若獲得滿足，則中國仍能獲得西方援助。

民初以來，西方首次發自內心要協助中國人是透過宋美齡將中國女性化的結果。宋美齡是中國人終將西化的寓言，所象徵的不是黃禍而是難以抗拒的吸引與綺麗（石之瑜，1996）。但真正當時的主流，是宋美齡所無法取代，駕乎其上，且又爲西方所不可接受的蔣介石。早先西方同情過那個力圖振作而不可，但起碼嚮往維新的光緒皇帝，並

對付他那代表本土反彈的天朝中國的國母慈禧。至今西方人仍在想像任人擺弄，值得愛憐的末代皇帝溥儀(周蕾，1995)，多少是在彌補數十年來以反帝為訴求的中共政府製造的沮喪。中共抵觸了西方女性化工程所加諸的角色期盼，所以西方要找尋人們感怒而不敢反抗的蛛絲馬跡，把自己規劃成一個要打開中國大門，解放人性的救援者，於是中國人就必須接受女性化的洗禮(C. Enloe，1989)：

比如，全球化勢力在世紀之末大量重入中國之際，三〇年代的婦女形象又重出現在媒體上，各種消費品廣告，無論是否關乎女性，常刊載女性形象(Lily Ling，1996)。次比如，西方政客與傳播界，自八〇年代初期一胎化政策推動以來，便致力於挽救中國嬰兒，尤其是女嬰。又比如，批判中國人權政策最厲的西方各國的中國通，不成比例地娶了中國婦女為妻。復比如，色情交易迅速在中國社會復甦(Hill Gates，1989)，其中服務於國際部門者，是本行業得以繁榮的主要因素。再比如，大量的中國女性青年知識分子在這段期間開始留洋，經由通婚取得在當地國居留的途徑。再復比如，愈來愈多的女性，進入國際性大公司工作，而性騷擾的案件成為社會上普遍傳聞。最後，中國的女工則迅速成為勞力密集外資產業的僱用對象。

傳統中國婦女取得主體性的捷徑，是成為男性的另一部份，但什麼才是代表男性氣質的主導力量，則可依情境而轉移(Tani Barlow，1991)。過去的婦女受限於家庭的結構，依附在先生的主體地位中。在國家成為主要的資源配置者之後，婦女對父權國家體制的依附，也成為取得主體性的方式，此之謂半邊天的解放政策(Karen Korabik，1992)，但這種解放沒有改變國家對內的暴力壟斷特質，對外的排他性宣告，以及國家領導人以男性為主的鐵律。在家和國兩種下與上的父權體制之間，於今因為跨國公司的介入，而出現了另一個效忠的情境。跨國公司講求的也是男性氣質：流動性、地區局部資源的可棄性、資本的壟斷性，現已成為女性轉移效忠的另一父權對象，也協助女性取得家國體制之外的主體性。本土企業的管理階層不利於女性打入，跨國公司遠來本地，兩性均無特殊管道，則對獨立謀職的女性專業人士相對有利。

在同一時間內，中國男性並未擔心父權機制的衰敗。雖然女性意識在八〇年代之後有了很大的覺醒，不過這種覺醒只是針對女性自尊的恢復，對於男女兩性在生活條件與工作條件的結構因素方面，並未見根本的調整。不但女性的大學專業訓練比較不利於擔任領導職位(Karen Korabik，1993)，而且由於家務工作相對仍以女性為主體，使得職業婦女必須仰賴孩子的祖母來協助育嬰(P. Kane，1976)。通常高學歷、高職位的女性，有個比他們學歷和職位更高的配偶，因此女性在男性之前的自卑情結，未必因為關

於女性自尊的語言充斥，就能根本的獲得抒解。當女性確實地進入領導職位時，作為人事部門主管的比例依然高於其它職位(Marlyn Dalsimer and Laurie Nisonoff, 1984)，反應出女性的關係取向，以及女性面貌的親切性。

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做抉擇時，即令是事業心強的女性也都能認知到，家庭責任的妥善承擔，仍是作為妻子或母親應有的德性。許多中國婦女就接受，先生本來在各方面都應該強過太太。作為妻子，倘若事業心太強，威信將有害於先生的事業(Margarte R. Weeks, 1989)。這些態度說明，女性的附屬地位，反而變成可以接受的現象；因為這顯然是一種自然淘汰的結局。因此可以說，全球化經濟仍繼續將女性固定在一個次等的、依附的女性化角色裡。如此一來，脫離傳統經濟只為女性帶來口頭的地位調整(X. Lu, 1984)，似乎女性專業地位的建立必須更徹底，才可能緩和女性的繼續女性化，但在此，人們碰到更大的阻力。

全球化對資本主義也帶來威脅，如新加坡與日本就危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地位。本土化從另一方面顛覆資本主義與民主的意義，這方面以伊拉克和俄羅斯是較好的例子(Lily Ling, 1998)。此地需要一些性別取向的方案，來淡化上述兩方面對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威脅。這是一種交換，即後殖民主義繼續被定位在女性的形象中，不成為全球化潮流的參與推動者，則可以防止「他們」（日、新、伊、俄）變成「我們」，故全球化便不再等同於西化。如此將本土化和國際化對自己的衝擊，變成是落後地區充滿情緒化的反彈，則西方又能一定程度的釋懷於各地的西化與本土運動。故對於西方而言，中國專業婦女進入全球化潮流有助於中國女性化形象的鞏固。

不僅海外氣氛不利於女性專業精神的長期培養，中國大陸的本土情境亦仍對所謂女強人的形象高度反感。偏偏早年辛苦單調的婦女形象（五、六0年代），經歷了勇敢、成功的奮鬥形象（七0年代），已在目前為專業女強人的形象所取代（八、九0年代）(Feng Xiaotian, 1993)。這些形象的虛構成分居多，但多少讓專業女性稍能安於其實未必改善的工作、生活環境。婦女運動和工作者過去曾力圖改變婦女的軟性形象，效果雖然不錯，但在媒體刻意刻劃下，專業女強人的生活顯得十分不快樂，充滿焦慮(Stanley Rasen, 1994)。這也許是事實，但又非女強人所能逃避。女強人的形象是進入全球化潮流的代價（雖然有人樂此不疲），但絲毫未改變西方與本土勢力對「女」比對「強人」更注意的習性(Xie Heng, 1990)。

四、台灣的後殖民女性主義

要探索「中國」的涵義，除了文化上的模糊區域之外，在族群、地理、歷史、政治等方面的模糊區域，也必須加以分析。往往這幾方面的模糊現象，又是與後殖民經驗及當下的全球化、女性化工程有所銜接。由於後殖民經驗影響天朝中國轄下各區域的程度不一，且他們受全球化潮流撞擊的面向各殊，使得站在全中國位置要振興民族的人，必須在宏觀上全面地選擇一種對全球化的鮮明立場，方能轉移並淡化各地受限於不同的後殖民情感而造成的潛在衝突(戴國輝，1994)。

實際經驗中，代表全球化價值的西方宗教、學術、媒體廣泛而深入地進入民族地區，蘊釀當地人們與西方價值接軌，而成爲民族振興的反向工程(例見曹長青，1996; S. Harrell，1994)。同理，沿海或沿邊快速地在執行跨越疆域界線的交流活動，從而出現南北不均或東西差距之類有礙一統氣氛之發展。各地因循既有的殖民經驗，對於其它區域缺乏諒解，致對於同一個特定殖民者的歷史評估不同，而產生彼此情感上的否定，更加深對「中國」此一概念的撞擊(例見劉長陸，1995)。最後，在知識上大量仰賴全球化資訊與分析框架的學者與政客，從語言上顛覆了固有價值在公共生活上的信用，使人們用文化上不熟悉的觀點自我評估，疏離於中國的脈絡之外(例見聯合報，1994)。

女性或陰性氣質成爲一連串後殖民工程的主要內容。首先，人們將本土民族與原始、生命力、自然、待開發、純潔等女性化氣質相結合(P. Steven Sangeren，1988)，這些說法所表達的，都是西方全球化潮流先鋒已然失去，但又亟思尋回而不可得之後現代價值。他們在少數民族身上找到這種價值，投射了自己的需要，在呵護憐愛他們的同時，鞏固了作爲一個先進文明所需要的陽剛氣質。其次，西方政客與學者，在地理上爲中國劃出一塊固定的疆域，期待人們安於其內不要外溢成黃禍，如此保障了全球化推動者在觀念上壟斷跨越地域界線的權利，也就固定了中國人的範圍是在自己的家中；當中國人在港台與大陸之間往來加速之際，則又在地理上以「大中國」地區定位之(例見David Shambaugh，1995)，透露出深層的女性化傾向，以防中國與自己混淆難分，唯地理邊緣的人依舊進進出出，造成性別意識上的錯亂。

再其次，中國歷史因殖民主義的多重性與不完整性而難以建構。多重性肇因於多國殖民，不完整性是由於無一殖民工程會遍及全中國。其結果，不同後殖民經驗的人，傾向將別人的經驗看成是落後的或依賴的，於是有了相互女性化的貶抑之風，誰處在歷史的邊緣，誰有建構歷史的發言權，似乎決定於誰能證明自己的本土純淨性，這便要求展

現陽剛，與對中國內部的其它人進行女性化工程(例見李登輝，1996；李家泉，1994)。最後，中國人傳統政治價值的邊緣化，已使得西方政治慣用術語大舉入侵，故如民主、自由、人權充斥在中國人的政治圈中。這些概念根深蒂固屬於父權價值，早經西方女性主義者所一再闡明，則中國人的群性、服從性，就不得不成為女性化的對象與證據(Lily Ling，1998)。

台灣在上述各方面都有所牽連，難免就對中國的概念產生多重的撞擊。比如，台灣作為中國之內的一個新興民族，與台灣近年來原住民政策的變遷同步發展，此一進展並配合蒙藏政策的轉型而出現。這種對自身原住民的形式尊重，與表達對蒙藏成為中國之外獨立國家的歡迎，共同建構出台灣新興民族的原初特質與活力形象(類似例子參見David Campbell，1992)。而台灣地處中國的地理邊緣，與世界各地的往來原本超越與大陸的往來甚多，唯九〇年代以來形式丕變，使台灣是否為中國家庭之內成員模糊不清，因否提防台灣也成為全球化勢力的難題：台灣作為中國之內的新興民族是一種發思古幽情的形象，引發全球化勢力的同情(例見Allan M. Wachman，1995；B. Lin and J. T. Myres，1996)；台灣在地理上由中國之外被納入中國之內的趨勢，則遭致全球化勢力的猜忌(傅建中，1997)。

台灣的日本殖民經驗，培養了對支那中國的疏離感與優越感，而中國近代史的抗日經驗，則孕育了當代中國人當中普遍的反日立場。反日的後殖民情緒對台灣的歷史，抱持否定的態度，使之成為一種不能表達的情感，形成台灣人在面對大陸時的自我壓抑。這種壓抑說明了台灣對大陸的疏離，與大陸的反彈。疏離的推辭是，大陸太落後，而不是台灣要親日，但大陸是否落後的判斷標準，則是來自日本與美國則迥無疑義。這個標準除了因循日本對中國的睥睨之外(辛向陽，1996)，也反映出在冷戰期間自美國習得的政治價值，美國是當今全球化工程的主力，也是中國本土勢力要排斥的首要對象。故當台灣採用美國或日本價值標準來評斷中國時，大陸的反彈自然強烈，從而不擬承認台灣有其真正的本土立場(李家泉，1994；崔之清，1994)。

可見，台灣在何為中國的問題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否釐清，決定了中國是否可以被明確的定義，或中國能否被化約成是一個民族、地理、歷史、政治的概念。欲釐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就必先說明台灣本身的中國成份。在台灣以及台灣之外的中國人深受著後殖民經驗所束縛，而且兩岸彼此不能相互體會，或雖能體會卻仍不能接受彼此後殖民經驗的情況下，對台灣的研究就成為政治問題，則中國能否定義的根本問題，也就理所當然地是一個政治問題。這連串的政治問題要處理的，也同時

是中、西對中國看法的歧異。若將之加以濃縮，無異即是針對台灣的文明交匯位置，加強探索。

台灣的雙重位置是後殖民經驗所決定，而後殖民經驗的形成，往往表現成某種女性化工程。如前所述，後殖民女性主義者早就提出，後殖民經驗與女性化工程不可能單純地等同於西化。故無論西方對台灣的女性化，或台灣對大陸的女性化，都必然出現後殖民突變。台灣要爭取全球化勢力的支援，就必須滿足西方對自己的女性化期待(P. C. Chang, 1996)，但台灣本身的本土意識，不能在女性化的氣氛下崛起，故為了灌輸陽剛氣質以能主張自己，又有了將大陸當成女性化對象的需要(類似現象參見 T. D. Truong, 1990; A. Sherry, M. Lee, and M. Vatikiotis, 1995)，這包括一國兩妻與色情行業的發展。類似的現象在別處也看到，但本土勢力因之勃興以後，當然便不能容忍國際上對台灣的女性化，此一反彈將看似幼稚，又誘使全球勢力重將台灣歸諸中國範圍之內。則研究台灣女性在台灣進入全球化潮流中的角色，就可以成為解答中國定義為何的一個具體起點，但求藉由台灣女性的經驗，來說明女性台灣在中、外之間的定位。

五、台灣研究的構想案例

台灣的經濟在冷戰中迅速成長，威信是靠著其間靈活的中小企業結構，人們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中的調適得宜，每能因應新局。較少為人論及者，是女性在此一全球化潮流中的角色。中國文化之下的女性，擔任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生養育的責任，蓋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不支取男工同樣的薪資，在家庭事業中也不要求支配事業資源，因而有助於小量資本的累積(Hill Gate, 1989)。她們每在宏觀經濟的下坡階段，又能適時退回家中；其中不乏在名義上擔任家長、董事長以致於涉入配偶的債務糾紛，代夫坐監，但求家庭經濟重振的機緣不至中斷。大量女性在經濟市場之外的貢獻，使得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未因為資金的不足而淪為國際企業的附庸。相反地，女性的隱性生產角色，強化了中小企業的生產彈性，而因此所累積的中小規模資金，鞏固了中小企業的生產結構，厥為早期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影響(L. Cheng and P. C. Hsiung, 1992)。

台灣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位置，也帶有女性氣質。在父權體制之下與後殖民結構中，女性因應的策略何其多(Margery Wolf, 1972)，但鮮有以另一種強勢姿態抗爭者，此台灣的生產者安靜地接受全球化潮流每次所賦予的機會，默默地利用既有的條件改善自己的生產利潤結構，而不從事市場上公開的挑戰或叫陣。但結果卻又因為能在全

球化的國家經濟實力標準上迅速攀升，而成爲世所矚目的亞洲小龍之一，也因此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國際企業來台設立分公司，不再將台灣當成廉價勞力供應地，而將之定位成全球化的地區性工作夥伴。

然而，這又不代表台灣脫離了全球化潮流的女性化工程。首先，國際性大公司在台設立分公司，與台灣婦女的平均教育水準、專業訓練的提昇同步發生，小家庭與都市化又爲其重要的社會背景。在婦女專業人才日多，加上本土企業之中對女性晉升主管職位有明顯的文化瓶頸，使得跨國公司成爲她們重要的爭取對象。¹某些在西方極度專業性，由男性主導的工作，在台灣的跨國公司，或具跨國性質的行業，都由女性擔任。又有些行業如會計，在台灣傳統由女性擔當，主要是中小企業爲避稅必須維持多本帳冊，故只能委由心腹主持，此非配偶莫屬，故會計專業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不如建築、法律、醫療等部門，但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台灣分公司卻又不得不滿足其總部的會審要求，反而提供此一婦女專業進入全球化工程之契機。²

其次，婦女專業人士原本承擔之生養育工作，又必須有人接手，才能將彼等解放於家庭之外，此地有兩個選擇，一是僱傭，另一是尋求父母的幫助。毋庸置疑者，這些僱傭絕大部分是女性，有的來自下階層的勞動者，有的則是跨海而來的外籍勞工或非法偷渡的大陸客。而藉助上一輩的，其前提是孩子的祖母或外祖母必須較早退休，或者根本一直長期是家庭主婦，換言之，即不可能如媳婦或女兒一樣，是個專業的工作者。唯有這兩個條件都不能滿足時，托兒服務才成爲相對而言仍可接受的安排，³可見，全球化潮流對婦女專業人士的收納，並未改變台灣婦女在宏觀上的地位，只是將生、養育工作轉嫁給社會中的其他婦女，尤其是那些早期在殖民經驗中成長或當前在全球化潮流中流離的婦女。

婦女專業人士身處於全球化與本土化兩股勢力之間，扮演著微妙的協調角色。在外商公司的後勤部門，常由本土女性專業人士領導，但其它一線主管則仍以男性爲主。後勤部門執行若干公司品質管制的工作，對外商總公司負直接責任，則就有女性有機會能代表全球化潮流的規範，面對技術生產部門的本土男性，這亙古未有的發展，一方面降低了全球化勢力對於本土意識的威脅，另一方面也使本土特色的脫軌行動，對於總公司

1 依 3 號、4 號、8 號三位受訪者的描述。

2 依 15 號受訪者之訪談。

3 在以下受訪十五名女性中，十二人是靠媽媽或婆婆，一人靠姊妹，一人靠褓母，一人未婚；另有六名男性受訪者，三人靠太太，一人靠褓母，兩人未婚。

的抗拒有了緩衝。相對於此，當本土男性主管在抵制全球化規範時，或當總公司在責怪當地公司履行公司內規不力時，夾在其中的女性專業工作者的反彈，想必看起來相對溫和得多。

女性專業人士偶有加入外商的行銷工作者，故她們與台灣本地公司的接觸，也是一種女性對男性的推銷，這就使得全球化的產品具有一種附加的吸引力，此依吸引力不來自產品的本身，而來自推銷主體的性別，而她們在工作績效的壓力下，自然有意識地操縱這種情緒。女性專業人士基於後勤工作的特質，也需要與其他外商或本地服務性的行業接觸，這往往是女性與女性之間的互動。她們本身俱是憑藉專業素養取得職位，而且人際關係網絡不如男性綿密，故本質上，她們之間的互動比男性更能符合全球化的專業規範，則全球化的潮流在台灣的建立與傳播，便與女性專業人士打下不解之緣。最後，女性專業人士在領導男性部下時，受到總公司的支持，因而所面臨的抗拒較小，此一狐假虎威的效果，對於外商建立當地工作的紀律，也可以有所幫助。

分析女性專業人士在台灣加入全球化潮流的意義，有助於理解中國的涵義，因此可對「中國研究」有所啟發，這可以分為兩點。第一，女性專業人士處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雙重身份，類似台灣處在西方與中國之間的雙重身份。西方（與中國）將台灣女性化，以及西方透過台灣將中國女性化的現象，和外商與本土主管將女性專業人士女性化，以及外商透過女性專業人士將本土男性女性化的現象，頗為雷同。台灣處在中國歷史與地理的邊緣，和女性專業人士處在台灣企業文化與公司技術部門的邊緣，亦可以相互類比。故進一步分析理解台灣女性專業人士的自我調適，無疑對於宏觀而抽象的台灣後殖民身份，能作出更深刻地理解。一旦能體會台灣的雙重身份，以及其間蘊涵的後殖民結構與女性化工程，就必能協助說明中國之內的全球化潮流和民族振興需要是矛盾共生的。

第二，台灣專業女性在外商公司的調適策略與心態，值得與台灣本土領袖在全球化潮流下對中國認知方式的轉變相印證，也應與中國本土領袖在全球化潮流下的民族振興訴求相比較，檢視不同策略所帶來的結果有何差異，這個差異對於理解「中國」概念的含糊性有何澄清作用？及中國人對後殖民女性化工程的回應，有多大程度是在全球化潮流框架下進行？又有多少是會顛覆改變全球化的內涵？同理，此一回應對於既有關於民族振興的種種說法，產生了什麼或積極、或消極的作用？最後，台灣女性專業人士、台灣、中國之間的關聯，會否孕育出一個女性中國，不再受困於有關「中國」能否加以定義的難題？

六、台灣女性進入國際專業

專業化的現象，本也是資本主義流行之後才普及的，當然一般都是以男性為主。所謂專業之所以會成立，主要是有一套專業規範和專業技術，這些技術經過有系統的組織與訓練來傳授，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專業人才，他們在執業的過程之中，又遵循一些既定的原則，對內以保障專業倫理，對外則維護專業形象，阻絕外行人涉足專業領域。專業領域的出現，也得力於政府的介入，透過立法與行政管理，政府往往以執照發放的方式，來授與專業地位一種公信力，所以專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微妙的，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相互支援義務。這種微妙的互動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蓋全球化之所以能夠發生，仰賴全球化工作者採納一些共通的行事準則，專業規範乃其犖犖大者，而專業規範能行諸世界，也不能不靠著政治力的有形或無形的支援。

由於專業精神強調的是技術與訓練，故其核心必然涉及某一種科學知識。科學知識來到中國最先靠得是傳教士的輸入，故並不是有組織的引介。但較諸中國人熟悉的口耳相傳，卻又顯得客觀的多，任何人只要透過一定的程序，都能操縱自然。專業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的肇端，應該溯及洋學堂與西醫院的成立，這些當然都是傳教士的功勞。爾後資本主義大行其道，中國必須與世界全面溝通，因此而慢慢出現了外交、法律、軍事、建築等方面的科學專業，吾人常謔稱此輩為買辦，因為彼等食衣住行都師法西洋，以謀能躋先進人種之林，但究其實又是依附在中國本土社會中謀利。

中國女性進入專業領域則是晚近之事，因此並沒有與古典的殖民主義直接交易的經驗。二十世紀末的後殖民發展，則是以前此殖民主義留下的秩序為主軸，但並無以洋槍大砲逼人就範之情事再現。雖然國防武力仍是重要的背景因素，但真正起影響作用的，則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名之為文化霸權的一整套語言、邏輯、價值、準則(Nicos Polantzas, 1974)。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全球結構之後，對於這一套文化霸權的熟稔程度，決定了一個人能力爭上游到哪一層級。同樣地，因為貪圖資本主義力量提供的若干近程利益，也可能使人淪為欠缺長期累積能力的無產勞動者，並接受自己相對不利的社會位置，卻還以為是自己個人特質不如人的結果。但中國作為一個不完全的多重後殖民社會，又有其深厚的本土文化，則在資本主義之下抵抗的能力，相對地強過多數的非西方社會。

相形之下，台灣就沒有那麼幸運。所以在冷戰時期，美國文化大量進入，台灣人選

擇與想像的空間都受到限制，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的各種專業，都抱持著為我所用的心情，照單引用，這使得台灣成為全球化專業領域的一環，要比大陸早了許多。故也就決定了台灣在大陸遂行開放政策，重新歡迎資本主義再進入大陸之際，成為香港之外另一個外商公司進軍大陸的跳板，台灣的專業人士頻繁地進出大陸，為外商公司在大陸籌設分公司，盡心盡力地張羅，其主要功能，就是在設計公司內部制度與對外營業方針，將分公司的運作架構在外商的全球化規範之下，使得位於西方的總公司，能有一個雖蠻陌之邦行矣的管理機制。

隨著自身益加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台灣的專業種類分工更見細密，藉著政府以發放執照來規範的行業日多，由各類高考與特考的設計可見一斑。早期這些專業幾乎都是男性的天下，在教育逐漸普及與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趨勢之下，女性才慢慢進入專業領域，一方面透過考試發放執照並無明確的性別歧視（除非如過去外交特考限制女性錄取名額），二方面女性求職者有專業保護，比較不受陞遷問題所影響，使得女性在財務、會計、小兒科、眼科、司法、保險、教學等等領域，開始展露頭角。不過，在前往東南亞或大陸協助外商成立分公司的派出人員，則基本依然是以男性為主。同時，成為專業人士的女性，無論是否服務於外商，由於必須直接面對全球化的市場壓力，則又得將傳統女性擔負的生養育責任，轉嫁給社會上的其它女性。

如前所述，外商不但沒有必要限制女性，甚至歡迎女性專業人士加盟。專業所重視者是知識與規範，既然過去只有男性才擁有普遍性的知識，照說女性進入專業可以改變社會既有的刻板印象。但由於女性仍負生養育責任，故女性進入專業未必能對性別印象真正改造。同樣地，台灣雖然如同外商來台時一般，也前往亞洲各地協助成立分公司，但台灣整體不屬於基督教世界之一員，故又難徹底扭轉其文明弱勢的地位。此台灣在全球化潮流由西向東的轉接位置上，與女性專業人士所處的位置有重疊，因為她們也是全球化與本土化轉接的一環；另外兩者也有可資類比之處，因為她們都處在刻板印象中的男性與女性之間。她們如何看待代表全球化潮流的專業領域與自己天賦的女性身份，是分不開的兩件事。

以下將根據對十五名女性與六名男性的深入訪談，探討女性對自己在上述轉接過程中的經驗有何認知，望能有助於爾後分析中國問題時，有一個既有框架之外的參考依據作為起點，體會問題的深層性與複雜性。這二十一名受訪者係作者透過層層社會關係的聯繫所覓得，原則上儘量在不同行業中都能有兩名以上的女性，一名以上的男性，但若干行業如建築、政府、精算等方面則闕如。其中有兩名為作者所熟識，四名曾有簡單交

往。每一次訪談平均約九十分鐘，訪談記錄放存錄音帶，事後整理出約四十萬字的文稿，本文以下僅採用極少部分與主體論述相關的言論。凡是自行創業、開店、或協助創業開店的受訪者，均歸類為企業家與行銷，包括書局老闆、編輯主任、旅行社老闆、保險公司經理；需要專業知識與執照的歸為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醫藥、企劃、教育、新聞等（見表一）。

關於文稿之分析，本文未採用一般制式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採用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依據受訪者自身的經驗敘述，找尋他們在面對全球化規範時的接納或調適方法，所以不屬於當代主流的社會科學方法，而屬於詮釋的範疇，因此不求絕對的客觀性，也承認讀者有權利根據他們自己的關切，做出迥然不同的詮釋。每次訪談，均先請受訪者回憶自己進入目前工作之前的經歷，再根據他們的敘述，提出他們所關切的事來討論，他們的背景各異，所以訪談的內容也不同。由於沒有直接詢問任何有關主體性的問題，所以以下對於主體性的討論，是在受訪者沒有刻意思索的情況下，根據他們零星片段的表白所做的觀察。

七、專業女性對全球化的回應

在訪談設計中，「全球化」的概念是用專業規範與市場兩個面向來表達，兩者均是穿透地理或文化疆域的力量，也都與本土習慣或實踐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作用。本文以下主要的目的，就是觀察在普遍性專業規劃與市場壓力下，女性的調適方式，相較於男性，是否傾向於迴避主體性的追求，或原則性的堅持，從而對於壓力反彈的需要也相對較低。這裡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專業女性為主，亦即在工作中受到專業規範限制的兩性工作者；第二部分則以女性企業家為主，亦即在工作中直接面對市場壓力的兩性工作者。

女性專業人士對於全球化規範與本土習慣之差異，似乎有勝於男性容忍的能力。所謂容忍，其形態可能有很多種，主要都表現成某種對主體地位的迴避，故她們對是類差異，或不承認，或承認而不處理，鮮少出現要釐清自己主導思想的需要。這個特色就決定了女性要比男性更容易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生存，也促成充滿男性氣質的這兩股潮流，可以曖昧地共生，而直接間接進入全球化部門的男性，則傾向在觀念上在兩者之間選邊，不但如此，並有較強的慾望要得出一套原則，來處理本土的不適應。

首先，在法界，一位女律師論及本土差異時好像完全不存在適應的問題，認為美國

的法律和台灣的法律可以完全銜接：

……其實我覺得可以銜接，但這可能與一般人的想法有差別，因為我是覺得說，兩個地方的教學，當然啦，一個是從書上的理論研究，一個是從實際案例歸納，但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互通的。我覺得法律在於解決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會有基本面存在，他們也許推理方式、思考方式不一樣，但結論應不會差太多，所以我在美國考試，一般來講，我很習慣美國的考試方式，因為他們都用實例題來考。但是同樣方式，其實拿來台灣的考試方式也可以用得上……。⁴

相較之下，兩位男性律師對於不合國際規範的本土法律實踐，不但比較明確認知，甚至得意地提出一套自己也覺得離經叛道，但卻有用的應對方法。其中一位認為要先改造本土的當事人，才能改革司法：

在我們台灣人在處理事情上，情理法這個還沒有完全去除，所以常常在社會上會冒出一種聲音叫道義責任，這個道義責任其實就是注重在情，道義問題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道德問題。那我覺得道德是屬於一種個人的修養，並不是說在發生事情的時候，要加於對方……。那司法改革有什麼樣的當事人，就有什麼樣的司法，所以你要當事人強化起來，人也是等於改造司法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當然一個當事人進入司法體系，面對司法人員，他是弱勢，那把他強化起來是改造司法的重要手段，人家會說神經病。⁵

另外一位過去對英美法有「排斥感覺」，後來成為英美法大陸法的男性雙料律師，也認為國際規範與本土實踐有差異，但他要找尋兩種人共事的「proper mix」，不過，他相信他自己的訓練比本土專業者有「更多的角度」，故可以經常對本土的法官產生一些啓迪作用：

4 第 16 號受訪者。

5 第 5 號受訪者。

……比如說，今天走進法院，我今天可能會用一些我在國外的觀點，嘗試放進我們的訴訟程序裡面，那對於法官來講，離經叛道是客氣啦，這個找麻煩啊！甚至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說你根本不進入狀況，或者覺得你根本不是科班出身的這種感覺……，但天下事不一定是壞事，其實是一種不同的角度刺激，往往有時候帶來不可期待的收穫，因為幾下之後，法官說不定忽然被你刺激到了，有相當多這種經驗……。⁶

相對於此，一個曾任台灣本地女法官多年的外商法律顧問，就不強調自己作為價值主題的位置，相反地，她重視人情與生活，明白地把自己放在客體的位置：

……中國人做生意他是要人情，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合約的第一個 wording，不要那麼 offense 別人的 feeling，比如說，今天你寫同一樣東西，我們可以說不一定是怎麼樣……。我是 help 說，把你們想到的東西都寫下來，你不會那麼違反中國人的感覺嘛！那就是說，當你把法律的東西，跟你的生活，跟我的 client 的這個…跟他的 business life 合在一起，我說我是 helping them，幫他們去做到他的 business。⁷

兩性在處理國際規範與本土習慣時的這種差別，並不只限於法律界。像受訪的一位女醫生雖然明確認知到西醫與中醫格格不入，且不相信中醫，但她的態度不是去調和或改造，而是不處理，顯然她碰到自己不相信的東西時沒有什麼不安的感覺：

……我對它的感覺是因為很多都沒有根據，沒有我們受的教育，讓我們覺得科學的依據，我們是學西醫嘛！你知道他們西醫總是有一些根據的東西，經過嚴謹的實驗，有些學理的研究根據，所以我總是覺得

6 第 6 號受訪者。

7 第 17 號受訪者。

中醫，我對中醫是比較排斥啦……，【病人】一半以上他實際上還有尋求一些中醫的秘方，他或許配合你的治療，用西藥治療，可是很多病人他還是觀念上脫離不了中醫……，那我通常是不會絕對禁止他們做，不過我是說希望他們用的東西不要妨礙他的治療啦！我就不會特別去跟他們禁止，因為那你也無法禁止。⁸

受訪的男醫生則不排斥中醫，因為他父親是開中藥店的，對於「中藥藥材我一兩個知道」，但他認為事情應該有個道理，所以要和病人講清楚：

……多少他也看過中醫，患者有時候會講，他看過哪邊哪邊，然後如果他好了，他不會來，他不好，他才會說中醫弄了很久，我們有時候稍微給他解釋一下。當然並不是說中醫無效，而是說有時候他看的不是中醫，他可能看得是民間的民俗療法，跌打損傷那一種，那種應該不屬於中醫啦。另外一類的，因為我們剛好那個研究裡面有做，我們就跟他講……，都有給他解釋。⁹

男性的主體意識與女性的隨和在會計專業中也可以看得到。以美國六大會計事務所為主的台灣會計公司，是將國際規範透過外商傳入台灣的重要力量，這其中主要的任務，就是轉換本土流行的女性簿記，使成為理性且具有普遍性適用價值的會計專業原則。的確，一位純粹本土公司的女會計經理在這方面，偏偏就比較願意遷就本土的情境，以「滿足客戶的需要為優先」，其餘的「再回頭去處理」，所以會計是家務事，完全是後勤作業，沒有自己的個性。當被問及會計人員在公司中所受的尊重程度時：

我覺得還有點缺乏，就像我講的，這個公司比較傳統的公司，然後專業工作的人不是這麼多，就是剛剛所說的，他們只是在意結果，並不了解過程。所以他覺得你這麼重要……，我一直在一個單位，我也一直跟隨著一個女性的主管工作。那她給我最大的一個影響，我想就

8 第7號受訪者。

9 第14號受訪者。

是這個工作的本身，是一個很單調的東西，但是她給我們一種很嚴謹的工作態度，就是說你對你的工作上，就是實事求是。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的話，那你就能夠得到肯定……。¹⁰

即令在外商公司，一位可以獨自向國外總公司負責的女性財務長，則透露出一種看似無奈，但其實又有些無所謂的輕鬆態度：

…… sales 他們很老嘛！年紀比較大，然後他們比如說，我們公司都有硬性規定程序要怎麼樣，他們都不大願意遵照這些規定，反正他們說反正我接到訂單了，公司賺錢了。這是一方面也要靠你的老板，看你的總經理，他是不是非常重視公司的制度，但是如果你的總經理也不太重視的話，你們就很難做。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看你的總經理是不是能夠接受你的意見，非常珍惜你，這樣如果說你叫不動別的部門，可以透過你的總經理，就只有這個辦法。¹¹

唯一受訪的男性會計師則十分堅持自己的會計專業規範，寧可損失生意也無妨，但他強調願意協助本土企業向健康的制度轉型，而且提供他們全面的、完整的配套管理諮詢，他對於好壞的標準很明確，而且有意願推廣之：

……我們還看看這個客戶好不好，所以只有你是大事務所的時候，或者甚至這已經是你的客戶了，他做的不好，你跟他講說對不起，我不要你這個客戶了。或者說，我們財務報表我要簽這個報告，說你這個報告有問題，你要不要接受這個事情？……所以我想大概只有一種狀況……，他有很清楚的意願，所以我們會協助他，基本上我們會給他一個輔導的期間，……在查的這個過程之中，我們怎麼去提供 leverage，除了這個之外，我怎麼去提供客戶 total solution.¹²

10 第 4 號受訪者。

11 第 3 號受訪者。

12 第 15 號受訪者。

再一個專業就是業務規劃，這項工作是要訂定業務目標，公司的立場當然是要高標，但站在行銷的立場，就希望要壓低額度減輕壓力，上述提到的性別差異，在這個專業中也不例外。一位女性外商主管就最重視折衝能力與人際關係，而不是凸出自己的專業判斷，或強調抽象的預算或計劃：

…… line 上的人就比較傾向保守，尤其是你在這個公司有 compensation，就是你的薪資制度是跟 result 結合在一起，那個壓力就非常人。所以一般你就是 planning 的人，壓力都很大，因為你唯一的資料來源，就是從 lines 上面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再來分析會診，然後作出策略規劃……。所以這種互相依存，可是又可能有衝突，這種關係就是這種工作不是很好做，這種工作很容易很挫折……，做這種職務的人確實需要一些就是，你需要很好的折衝能力，在組織裡面有很好的人脈，還有第三你最好是在這個組織長大的人……。¹³

但是一位男性主管則有明顯習自美國的行爲參考準則，他返國時首先把日式的公司佈置改成美式的，給每一個員工一點自己的空間，不再面對面坐，而且也不必由上級直接在背後看著；他引進電腦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時間表的概念，因此要訂計劃、做預算，減低老板個人喜好在公司營運上造成的影響：

……一方面他們可能是屬於從上到下比較威權式的管理，那麼比較不會主動去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就怎樣去解決？而比較傾向老板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老板不講話我就不動，這已經變成他們的一個習慣，這樣的結果就是第一個他們不想，第二個沒有所謂的計劃。他們受到老板個人喜愛的程度很重，其實這個做事的態度就是觀念很大的不同。對我們這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來看，會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怎麼可能【沒有預算】……？三年半前我回來看到公司沒有預算很不習慣，前後我做了一些改變，加了不少東西。那個時候就講，以公司提供預算，三個月做一些活動，但有時因為時間的關係會改期，

13 第 19 號受訪者。

但一般來說會有一些公司的活動。¹⁴

但與之相比，另一位做計劃與訓練的外商女主管，對人的重視，就顯得突出了。她負責協助本土的客戶接受外商的產品，規劃商品相關的各種人才養成，照說產品的規格應該對她而言甚為重要，但她卻強調要因應客戶的性質來調整，雖然她在行動上看來很積極，但在思路卻不採用以我為主的一套規範。一般外商都知道產品要本土化，但怎麼做仍有風格不同，一切順應本土需要似乎是這位受訪者的哲學：

……我們常講人際界面，在電腦資訊工作裡面，人就是很重要的 factor，所以人的優先順序永遠高於機器，所以對 human factor 的掌握永遠高於電腦或是系統……，通常我們的電腦系統開始一定都是走美國的系統，不管 IBM、DIGITAL 這些美國系統，所以從我們一入這個領域開始，一定都是走美國系統……，那我們開會的時候很普遍，比如像一些中小企業老板，可能不是很能接受這些太專業的東西，那麼我們很多東西進來必須完全本土化，所以即便……在美國他的產品有一個中文化的過程，在台灣我們還是有一個中文化的過程，才可以做 translation。¹⁵

最後在新聞專業中，本土從業人員對國際新聞風格與內容的依賴，一直是受到討論的問題。大家在這方面有所批評反省，但受訪的女性與男性在談及對國際的依賴時，使用的主詞迥然不同。一位女主播兼新聞主管觀察到許多人對美國的依賴，她關切的是播報的風格，不是新聞的角度。比如某某某常講英文，但她覺得還構不上「American style」，她看到另外兩位男主播的美國崇拜，感到十分丟臉，雖然她也談了一些自己喜歡的新聞手法，但又覺得在「新聞專業上，是本身很類似的」，故各國的特色應表現在取材上的差異，她嘲弄那些風格上一味西化的人：

我上次去 ABC 參觀，看到他們的佈景跟【某某某】後面的一模一

14 第 8 號受訪者。

15 第 9 號受訪者。

樣，然後更好笑的是【某台】我那天剛好去，因為我在播晨間新聞是在那邊播，我剛好看見他們剛好用了一塊一模一樣的板子，然後午間新聞又用了一塊一模一樣的玻璃……，以前連我們的片頭都用人家的，所以以前美國人來還說奇怪，為什麼在你們這邊看到美國 ABC News 的片頭？我還以為回美國去！真丟臉。¹⁶

好笑固好笑，她本身則想模仿歐洲「反璞歸真」的取材手法，與美國新聞中的「人文關懷」，多做一些貼心小人物的故事。而受訪的男新聞主管，在述說台灣對國際新聞的仰賴時，則透露出一種自己所感到的壓力，故他就提出明顯的改革方向，即要把日本的觀點引進台灣，至於報導手法或從哪裡取材，他完全沒提到：

……台灣的國際新聞一直仰賴外電的多，而自己處理的少……，我以畫面為第一要務，我根本沒有辦法考慮到那件事……，我能要是哪一個外電最先有畫面我就先播出去了，那你會看到你當然會知道這些都是歐美記者觀點去看事情……，好像全世界你看到的媒體就是把伊拉克說成壞人一邊，美國就是好人……，但是如果你用法國人的觀點，你甚至用中國大陸的觀點，你就會發現那又是另一種觀點……，這牽涉成本問題……。日本我一直認為很重要，因為不可能不重視日本，可是你去看我們電視三台裡面，幾乎沒有日本的東西、日本的發明、日本的經濟、日本的政治……，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們算是已經還注意到日本了，那像法國根本就沒有辦法。¹⁷

八、本土女企業家與行銷

男性對自己所處的位置加以澄清界定的傾向，不僅存在於國際部門，如上述的外商，或適用國際規範的本土公司，也似乎存在於本土部門。本土企業並不直接與全球化潮流互動，但他們一樣地生活在全球化的資訊網絡、商品市場、消費價值之中，他們的

16 第 10 號受訪者。

17 第 11 號受訪者。

客戶自不例外。若要了解全球化潮流對他們的壓力最簡單的觀察點，或許是看他們如何因應市場的壓力。在本次受訪者當中，屬於本土公司的大小型企業幹部或老闆有兩名男性、四名女性，其中男性對行銷的執著，超過女性甚多。受訪女性皆有某些市場之外的考量，使他們對市場的立即成敗，沒有絕對的得失心，而業績卻主導著男性的思路。一位男性的書局主編分析他的工作：

……這邊發展這麼快，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很少有出版商像我們是從行銷轉變到成出版社……。因為現在的行銷喔，彼此大概都有彼此的路線，像【M公司】來講，【M公司】賣的最好的大概是像筆記書那樣的書。本來筆記書不好賣的，但就是因為【M公司】賣的很好，現在如果大家想要賣筆記書，大概就會找像【M公司】那樣的公司。那【N公司】因為他發書的範圍比較廣，可是像【W公司】的話，他也是有些學術性的書他能夠發得動，那變成每家有每家的特色……。因為出版這個行業，他的競爭是一種比較柔性的競爭，一般就是靠自己的行銷能力……。比如說我們今天出了一本很有理想的書，假設像這樣這樣的書，就是說台灣缺乏這種書，而且台灣需要那種知識，那很努力地把他寫作出來，但是讀者迴響怎麼樣並不知道，很可能這個書完全失去了你花一兩百萬的心血，完全失敗了，很可能。所以出版社雖然是一個文化事業，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商業性的。

18

相對於此，一位女主編對於書的感情卻沒有那麼地行銷取向或商業化，她喜歡小規模的，點點滴滴的經營風格：

……每一本書都要從頭開始，這種東西本身就是一種屬於很精緻、很需要人才的東西，所以每一本書的狀況不一樣，每一本書的判斷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是覺得說在某一個範圍，也不要出很多很雜的書，在某一個範圍然後每一本書都很精緻的來選擇，那也不多做浪費……。

比較好的形式其實是一個小小的，而且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文化性的工作，而不是商業性的，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我們這種形式啦！我們自己一邊讀書，一邊等於是玩樂。¹⁹

但是另外一位男性書商雖然最早是因為「想看書」，而「到出版社看書可以不必花錢」而走上此行，但闖市場，純靠行銷的氣氛很濃，因為他早期根本沒有能力出版：

……如果說我有結婚，有家庭壓力，我勢必要緊守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因為我就不可能去嘗試失敗，那就是說以我在這個出版社，就失敗過一次，失敗過一次不是說就垮掉，因為我當時剛開始創立這個出版社的時候，它的資金是零……出版界的朋友他們把書賣給我，因為我沒有錢，所以一剛開始不能出版，因為你出版需要很多錢啊！對不對？那你跟所有的人的書拿來賣的時候，就可能你不需要自己花錢，那你就賺當中的差額嘛！²⁰

另一位受訪的女書商有與此天壤地別的風格，她每次行銷鉅細靡遺，如果一時說不通，不做生意也行，似乎看不到那種業績壓力：

……他們會以偏蓋全的說，女生就是這樣地囉唆，想這麼多又這麼多慮又這麼愛擔心，可是真到那個事實發生的時候問題就來了，爭執就開始了，最近就碰到好幾次這樣的問題，這就是我在工作上最會受影響到，那這種事情碰多了我就會想說，哎呀！又不是急著想賺這筆錢，如果工作的方式不能事前溝通，讓大家都無後顧之憂地去衝的話，那有些業務我們就暫時停下，因為這對我的業務發展是有一點阻礙的……。²¹

本土女企業家受訪者中另一位也不喜歡靠行銷，面對許多不遵循商業倫理的競爭，

19 第1號受訪者。

20 第18號受訪者。

21 第2號受訪者。

作為旅行業者，她仍寧可靠著與客戶的關係來維持：

……因為我們都是舊客戶嘛！都要有交待，尤其公司的做法就是口碑相傳的，不是那種打廣告的，我們完全沒有打過廣告，所以就變成你就是服務跟口碑在相傳……。有一個基本的客戶存在，所以你捨不得丟，因為這些都是你曾經用心經營下來的……，他們都說我的價位都比別人貴三百、五百的，【他】公司整個團整個公司在檳城設廠，他說他給別家旅行社做，那他給我做我就覺得說，像我這樣用心經營你怎麼會看不出來呢？我的感覺我就【你】公司【我】不做，他還怕到……。我是覺得說我這樣用心經營，老板竟然只要他【自己家】給我做，別人有便宜的，【他公司】就給別人做，那我是覺得說這麼會算還真不愧財團法人。我的個性是我整個公司不做，真的整個公司不做……。那他現在是我一位基本客戶啦！²²

換言之，行銷之外還有其他的情感在其中。重行銷的人是以自己的產品為主，設法說服潛在客戶接受，但本土女企業家常表達出對產品或對客戶的珍惜，那行銷就不是永遠最重要的，這在一切行銷至上的保險業，也竟不例外。一位女性保險經理是行銷專才，但她和客戶與屬下的關係，遠遠超過她的工作範圍，比如她為客戶花精力辦郊遊，定期有未婚聯誼（最高記錄一年四對佳偶），又開稅務講座，希望與所有人都建立友誼，而業績不必拼最好：

……我那時候管七十個人嘛，感覺太累了，未婚小姐管人多敏感。再者我感覺我沒有結婚，然後管這些歐巴桑小姐先生太累，有的夫妻吵架他們都沒心情做保險，你要跟他溝通，婆媳問題你也要跟他溝通，那我本身才二十幾歲，哪能想這麼多，等於那時候爬得太快也不好，所以那時候反正就下來當股長，我不想當那麼大……。我對公司真的忠實……，外商銀行流動率很大，這個很正常，客戶帶走沒關係，保險就不一樣，保險你走了，客戶變孤兒……，很多人誘惑我多

22 第 12 號受訪者。

好多好……，我這個人不會重利啦……，我不是想賺錢，我今天我把我自己當成學校的學生一樣，我希望我的功課在中上的，我每個月都要有業績，我有業績壓力……。²³

九、結論

本文一開始，就提到對傳統的量化研究方法的質疑，在知識論上接受了混血、陰陽共生的現象，因此研究時就放棄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分相離的客觀精神。所以，在冗長的前言中，用的是說故事的方式，訪談時也沒有固定的問題設計，由受訪者引領進入他們關切的事。如此一來，本文無法進行「科學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只進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用格物的態度，用力地、一再地反覆閱讀訪問稿，再主觀地將字裡行間關於主體性地隱涉，整理成本文自己的文字。因此，主體與客體的討論，從來不是受訪者回答的問題。用「社會科學」的標準來檢證本文的研究方法，這個故事一定過不了關的。但最後，應該提醒讀者的是，關於女性中國與女性台灣的想像與分析，每位讀者理所當然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此後殖民社會的定義所在。

後殖民社會最關鍵的課題，就是人們的文化認同模糊；性別政治最關鍵的課題，就是人的女性氣質被壓制。全球化浪潮之下，西方的資本主義與宗教文明重新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取代了過去以國家主權為機制的擴張行動，而改用跨國性的公司與民間團體的名義，到前殖民地推廣消費文化與個人主義。國家主權是基於武力和戰爭而發生、而鞏固，其特點是排他性特別強，故向來為學者指為男性氣質之極致。然而衝破此一體制的全球化浪潮，未必有利於緩和此中過當之男性氣質，因為全球化所奠基的是一種普遍性人性，不受地理文化的影響，不關心性別之間既有的差異，也不同階級之間的先天不平衡，遑論顧及不同族群之間的歷史偏見。所以，雖然強調的是一種游移跨越各種人為疆界的價值，但對於認同於弱勢文化、族群，或受制於性別、階級而難享受全球化的人而言，全球化剝奪了他們最終一塊屬於自己的認同。由此可見，全球化廢續了國家體制的男性氣質與殖民工程，當然也就需要有一些對象，來鞏固此一氣質。依此，全球化工程同時也一定包含女性化工程，凡接納了全球化資本與訊息的後殖民地地區，與世界市場取得直接或間接聯繫的個個角落，都成為適當的女性化對象。女性化工程的面向有多

23 第 20 號受訪者。

層，在心理層面把全球化波及愈晚的地區，看成原始的、落後的、待開發的、依賴的、情緒的文化；在語言上以女性化的詞彙描述之；在實踐上，大量與當地女性取得此尊彼卑的互動機會，甚或僱用西方社會之女性來管理與當地社會的關係。

由於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大陸會採取對全球化的抵抗，形成全球對之圍堵，這種形態自八〇年代大幅轉變，隨著當地改革開放的進展，不僅大陸內部又興起了民國早年的女性貶抑風潮，而且世界媒體將中國以女性化語言描繪的作法，又重新出現。在這中間，台灣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台灣早經全球化的資本、商品、訊息市場所洗禮，夾在大陸與西方之間，在西方之前接受的是女性化，在大陸之前又儼然代表男性化的全球潮流。於是乎，西方對大陸的女性化得以透過與中國女性的互動，與透過台灣的仲介，經由兩層的管道來進行。

台灣的女性所經歷之全球化潮流對女性的貶抑，是透過本土男性完成的，但台灣女性進入全球化專業領域，則受到全球化潮流的歡迎，她們是在擺脫父權，但卻有助於西方將本土父權透過她們加以女性化。經驗似乎顯示，台灣的專業婦女對主體性的渴求相對較低，對國際規範與本土實踐之差異，則容忍度相對較高，則由專業女性向台灣輸入全球化規範最為平順。同理，女性化的台灣對主體性的渴求也低於中國大陸，而對全球化潮流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容忍度亦較大，則由台灣向中國傳送全球化規範與價值，較諸直接進入中國，其間產生的碰撞要小得多。台灣不能接受女性化的話，不僅意味著中國大陸亦不可能默許女性化工程，也更使西方缺乏一個重要的軟化中國的機制，此何以台灣專業婦女進入全球化的專業領域，其意義不單純只是台灣本身的性別政治正在變遷，更關乎何謂「中國」之類的後殖民主義疑問。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 石之瑜(1996)，蔣夫人與中國的國家意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 石之瑜(1996)，美國媒體如何報導蔣夫人訪美行，*近代中國*。116:125-154。
- 石之瑜(1996)，蔣宋美齡的戰略思路，*中華戰略學刊(春)*。73-120。
- 辛向陽編(1996)，*百年恩仇*。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中國可以說不*。台北：人間。
- 李家泉(1994)，還有多少中國人的感情，*文匯報*。6月10日。

- 周蕾(1995), *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台北：麥田。
- 姜義華(1996), 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 *海峽評論*。65: 8-18.
- 崔之清, (1994), 李登輝集團大陸政策危險動向, *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8月1-6日。
- 崔之元, (1996), 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 *社會科學學報*。7: 49-74.
- 許信良, (1995), *新興民族*。台北：遠流。
- 曹長青, (1996), *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台北：時報。
- 傅建中, (1997), 台灣因素—反台警訊, *中國時報*。4月15日第4版。
- 華原(1990), *痛史明鑒*。北京：北京出版社。
- 劉長陸, (1995), *天變：中國政權解體*。台北：遠流。
- 戴國輝, (1994), *台灣與中國結*。台北：遠流。

二、英文部份

- Bark, R. (1996), Yellow Perils Return, *Observer* December 7.
- Barlow, T. (1991), Theorizing Women: Funu, Guojia, Jiating, *Genders* 10.
- Barry, B. and Russell H. (1982), *Rational Man and Irrational Society?* London: Sage.
- Campbell, D. (1992), *Writing Secur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Chang, P. (1996), Don't Dance to Beijing's Tune, *The China Journal* 36.
- Cheng, L. and P. C. Hsiung (1992), Women, Export-Oriented Growth,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Taiwan, (eds.) R. P. Appelbaum and J.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Pacific Rim* New York: Sage.
- Cohen, P. A.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lsimer, M. and L. Nisonoff (1984), The New Economic Readjustment Policie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Urban Working Wome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6, 1.
- Diamond, N. (1988), The Miao and Poison, *Ethnology* 27, 1.
- Donaldson L. E. (1992), *Decolonizing Feminism: Race, Gender and Empire Building*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Enloe, C.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ng, X. T. (1993), The Changing Images of Women--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 Magazine Chinese Women, *Chinese Women and Society* 26, 3.
- Fujita, K. (1987), Gender, State,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Japa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0, 6.
- Gates, H. (1989), The Commoditization of Chinese Women, *Signs* 14, 4.
- Han, J. and L. H. M. Ling (1998),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Hypermasculinized State: Hybridity,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n Kore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forthcoming).
- Harding, H.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rell, S. (1994),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1993),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 Judd, E. R. (1990), Men Are More Able: Rural Chinese Women's Conceptions of Gender Agency, *Pacific Affairs* 63.
- Kane, P. (1976), *How 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 People 3.
- Korbik, K. (1993), Managerial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3, 4.
- Korbik, K. (1992b), Wome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 The Status of Managerial Women in China, (ed.) W. Wedley, *Advances in Chinese Industrial Studies*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Krishna, S. (1993),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onic: A Post-colonial View o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lternatives* 18,3.
- Liberthal, K. (1982), The Background in Chinese Politics, (ed.) H. Elliso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 C.
- Lim, L. Y. C. (1990), Women's Work in Export Factories, (ed.) I. Tinker, *Persistent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g, L. H. M. (1998a), White Man's Burden as Dark Irony, (eds.) J. S. Fritz and M. Lensu, *Value Pluralism, Normativ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Ling, L. H. M. (1996b),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dia Reconstructions of Gender Identity in Shanghai, *Democratization* 3, 2.
- Ling, L. H. M. and C.Y. Shih, 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Face, *Review of Politics* Winter

1988.

- Lu, X. (1984), *China: Feudal Attitude, Party Control and Half the Sky*, R. Morgan, (Ed) *Sisterhood in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 Millett, K. (1970), *Sexual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Mohanty, C.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C. T. Mohanty, A. Re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Olse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rg, 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 Polantzas, N. (1974),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Rigger, S. (1996), *Trends in Taiwan: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B. Lin and J. T. Myres, (Eds)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K. (1996), *Of Mail Order Brides and 'Boys' Own Tales*, *Feminist Review* 52.
- Rosen, S. (1994), *Wom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Opportunitie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September 1-4.
- Sangeren, P. S. (1988), *History and Rhetoric of Legitimacy: The Ma Tsu Cult in Taiwan*, *Comparative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 4.
- Shambaugh, D. (ed.),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rry, A., M. Lee, and M. Vatikiotis (1995), *For Lust or Mone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8 December 14.
- Soguk, N. (1993), *Reflections on the 'Orientalized Orientals'*, *Alternatives* 18, 3.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Third World Network (1993), *Modern Science in Crisis*, S. Harding, (Ed)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ruong, T. D. (1990), *Sex, Money, and Morality: Prostitution and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Jersey: Zed Books.

United Daily (1994) (February 17): 1. Taipei

Wachman, A. M. (1995),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 1995.

Weeks, M. R. (1989), Virtuous Wives and Kind Mothers: Concepts of Women in Urban Chin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 5.

Wolf, M.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Xie, H. (1990) The Changing Role and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Issue Paper* 8, The 1990 Institute February.

Xin, X. Y. (1996), *A Hundred-Year Hatred bai nian enchou* Beijing: Beijing Social Press.

Young, R. (1995),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Taiwanese Professional Women in Postcolonial Feminist China Studies

Chih-Yu Shih

ABSTRACT

Discourses on globalization still seem to need an other. They set up encoded dichotomies such as cosmopolitan vs. Parochial, capitalism vs. Tradition, and so on where the first and second terms implicitly stand for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respectively. These codifications carry gender associations as well with “masculinity” valorized over “femininity.” Creating the other thus guarantees the continuance of feminizing project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Evaluations of China from the Western-trained “experts” are a case in point. They need to objectify China into a separate and underdeveloped other; or else their sense of observational and geopolitical (masculine) superiority may be undermined. Professional women in Taiwan, in contrast, offer one model of “mobile subjectivities” in a global economy. Caught between a masculinizing globalization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and a patriarchal local culture, on the other, professional women in Taiwan exhibit a relatively low demand for one clear-cut cultural identity, thereby rendering them ideal agents to cope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emands of globalization. Similarly, Taiwan is caught in-between. It must operate within a context of U.S.-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mediated through a recent legacy of Japanes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ominance while keeping alert to a Chinese chauvinism, also extant within the island, but rising to threatening levels of nationalism just across the strait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omen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may serve as an appropriate model not only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but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well.

Key words: China, Taiwan, Globalization, Feminism, Professional Women, Postcolonialism